

先秦时期中国思想教育实践的衍变 ——基于中西学界研究成果的对比分析¹

柴鹏, 丁三青

(中国矿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徐州 221116)

[摘要]中国学界对先秦思想教育实践的衍变进行了追本溯源和总结概括,并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立场建构起了现代化的学科研究体系。西方学界基于实证主义哲学的思维方式将对先秦时期中国思想教育实践活动的研究导向了世俗政治的实用主义立场,不利于科学呈现我国先秦时期思想教育实践的历史原貌。先秦思想教育实践经历了从以生存为主到人文主义关怀凸显、从以宗教性活动为主到以政治活动为主的衍变过程。新时代唯有基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语境下继续拓展与深化中国思想教育实践的研究,方能充分挖掘和发展中国优秀的传统教育思想。

[关键词]先秦; 思想教育实践; 衍变; 比较研究; 历史唯物主义

doi:10.3969/j.issn.1673-9477.2020.01.012

[中图分类号] D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477(2020)01-061-04

对于要实现教育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而言,积极借鉴优秀的传统教育思想显然是一条不可或缺的路径,但在此之前必须要对中国历史上尤其是先秦时期的思想教育实践活动及其衍变过程有一个基本了解。本文基于中西学界的研究成果,力求对先秦时期中国思想教育实践活动的衍变过程加以梳理,为还原先秦思想教育实践的历史原貌、发掘传统教育思想的时代价值贡献力量。

一、中国学界对先秦思想教育实践的追本溯源

对中国先秦思想教育实践的有关记载和概括早在古代典籍中就曾大量出现。例如《史记·五帝本纪》曾载:黄帝轩辕“修德振兵,治五气,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1],又帝颛顼高阳“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絜诚以祭祀。”^[1]再比如《礼记·表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2]724,《周书·立政》载:“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见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长伯”^[3]351。基于古籍中所记载的从上古社会至商周时期的思想教育实践活动,近代以来的中国学者进行了相关的阐释及总结。其中吕思勉就曾指出:“渔猎时代,还没有‘夫妇之伦’……所以‘饥即求食,饱即弃余’,而‘农耕时代,人民就都‘定住’,而且都有了‘储蓄’……生活程度既高,‘文化’自然发生了”^[4]21-22。陈登原也提出:“不仅氏族之关系,确定于农事既建之后,即其他各种文明之表见,固亦有基于农事者”^[5]121。也就是说在原始社会人们经历了从刀耕火种、逐水而居、以肉身生存为主要目的的生产、生

活状态,到生产剩余产生并不断累积、进而出现文化需求的渐进过程。而当“文化”发生时人们由是进入文明社会(阶级社会),此时“征服者掌握政权,不事生产,成为治人而食于人的阶级……合理的组织既变,则无复为公众服务……人与人之间时起冲突,乃不得不靠礼乐刑政等来调和、来维持”^[6]18。因此不难看出中国社会最初的思想教育实践的衍变体现为:从维系人外在的肉体生理向满足人内在的精神生活而积极转变。

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界在历史唯物主义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架构下对中国先秦思想教育的实践进行了新的思考。一方面有学者基于元问题和人学的视角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元问题的研究主要着眼和立足于人的自我超越这一内在需求,即人在从被动超越逐步过渡到主动超越的过程中,不断实现自身的发展与进步,体现出自身的生命意义和社会价值。^①进而言之,对思想教育实践的阐述理应重点关注其对人的自由和发展的重大、积极意义。另一方面还有学者提出:思想政治教育的首要原则是政治性原则,因而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才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元问题。^②故而对思想教育实践的概述也必须奉政治性为圭臬,应该体现出文明社会中阶级与政治的根源所在。还有学者基于狭义的政治立场认为原始社会氏族制度下成员思想交流平等,并非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灌输,故原始社会的思想教育实践并非真正的思想政治教育,充其量不过是处于萌芽状态。^③但另一些学者基于广义的政治立场反驳道:思想政治教

[投稿日期] 2020-01-06

[基金项目]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重大项目(编号:14ZD010)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柴鹏(1991-),男,山东郓城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与思想政治教育。

育的原始发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问题,不能“用我们当前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来判断思想政治教育原始发生问题”^{[7]28},原始社会思想教育实践中平等、自发的特征反映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初本真状态,绝非是先入为主、僵化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与教科书定义所得出的萌芽的结论。^④

总而言之,古代及近代的中国学者倾向于对先秦思想教育实践活动的原貌进行客观的还原,而现代的中国学者则主要在社会主义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背景下积极从学科专业的角度对其科学内涵进行了较有成效的概括和丰富。

二、西方学界对先秦思想教育实践的实用性解读

西方学者对中国先秦思想教育实践的研究一种是奉政治性为圭臬的解读,另一种是通过对儒家思想文化(孔子学说)的解读而渐次达及政治国家的层面。对于前者基辛格就曾认为儒家思想文化实质上是摆脱了宗教性质的世俗价值观。在威斯特伐利亚国际秩序的视域下,他以儒家思想中关于“皇帝”的概念为据点,进一步阐述了中国式的、集世俗与形而上为一体的普世价值观。^⑤换言之,基辛格对源于先秦的儒家思想文化在世俗政治国家治理中的运用的理解,是基于思想教育实践主要服务于“皇帝政治”这一隐性观点之上而进行的。而霍布斯鲍姆在评价李约瑟时也曾指出:李约瑟“不仅对中国人的自然观欣然接受,而且衷心喜爱这个建立在没有超自然主义的道德基础上的文明,这个不是以原罪理念为基础的伟大文化”^{[8]181}。霍氏认为中国社会用以思想教育实践活动的价值观念不具有宗教色彩,先秦思想教育实践中曾经的超自然现象(超自然主义思想和行为)消失了,思想教育只是作为一种服务于世俗政治的社会实践而存在。斯塔夫里阿诺斯也指出中华文明(儒家文明)现世主义色彩浓厚、宗教色彩淡薄,通过这种重视道德教化、实用性色彩强的哲学价值观对人民进行教育,能够让人们牢固地扎根于现实生活之中,为中国社会的政治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华文明由是具备了凝聚统合内部力量以及保持文明延续连贯的内在特性。^⑥

对于第二种研究,汤因比曾指出儒家学说作为政治哲学从一开始就内含合理主义和人道主义,这一非宗教性的内在特性使得受此教育影响下的中国人民逐步具备了优良的美德品质,因而更为容易接受理性科学的知识、建立稳固合理的社会组织,因此,中华民族或者中国就成为最有经验同时也是最有希望为人类社会和未来世界带来和平与统一的

民族或国家。^⑦而韦伯从预设西方资本主义模式普遍性的前提出发,在剖析先秦时代或儒学诞生之前中国社会结构与政治组织的基础上认为儒家思想的理性主义只是理智地去适应世界而非积极主动地去变革社会。因此作为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儒学从诞生之初就决定了它对中国人民的思想教育是存有巨大的消极作用和负面影响的,因而最终是儒家伦理思想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⑧沃特金斯则更进一步指出中国社会在早期原始的宗教巫术信仰衰微之后,儒家学派却成功地将先前遗留下来的古典仪式以一种理性的方式融入到包括家庭和社会组织体制在内的一切世俗之中,这种世俗理性主义使得儒家思想作为统治者的思想教育工具维持中国政治与社会的稳定达两千年之久。^⑨这种从文化角度出发进而达及政治层面的分析,更加贴切地从文明思想、社会心理等更为深刻的领域触及了先秦思想教育实践的原貌。

综合来看西方学界这种政治倾向明显的研究有着深刻的意识形态根源。站在思想史的角度,对先秦思想教育实践的研究同时也是对我们民族思想文化的起源或诞生过程的再现,故而对先秦思想教育实践科学内涵的总结必须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立场充分考虑到先秦时期尤其是商周时代的客观历史事实、社会经济条件以及文明思想状态等内容。但西方学界的许多研究都将先秦思想教育实践解读为祛除宗教色彩之后的世俗政治的实用性工具。而深刻隐藏在这背后的逻辑思维正是西方政治哲学中实证主义或实用主义哲学逻辑的再现。即西方学界对先秦思想教育实践的研究本质上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来阐述中国社会的实践活动。对于要客观还原先秦思想教育实践的历史事实而言这是不合理的。

三、先秦时期中国思想教育实践的衍变过程分析

综合中西学界的理论成果,就先秦时期中国思想教育实践的衍变过程而言,我们认为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先秦思想教育实践呈现为从“生存”到“人文主义关怀”的衍变过程。

不论是原始社会还是阶级社会初期,思想教育实践原始发生之时以当时的社会生产条件来衡量,基本生存即维持人肉体的生理存在仍旧是较为突出的问题,而人们则囿于对自然环境的了解,对大自然的敬畏心态由是而生,故而在对大自然崇拜的基础上导致神话传说、图腾崇拜、祭祀占卜等宗教性活动的源起。而“存在于令人困惑的原始宗教习俗

背后的却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在所有可能灭种的人为与自然力量威胁下，维持某一特定社会的生存”^{[9]25}。早先的中国社会正是通过这种宗教性活动对人们的思想施以影响，进而达到合理协调和组织人们实践活动的目的，从而维持氏族的生存。而当人们在农耕定居的生产方式下逐渐出现生产富余即逐渐向阶级社会过渡时，吕思勉先生所提及的“文化”也就渐渐发展起来，而当人们产生对精神文化的需求时，思想教育实践的主题也就从维持人最基本的生理存在，向通过对内满足人的精神诉求、以实现人对自身的不断超越和发展而积极转变。

第二，先秦思想教育实践呈现为从“宗教”到“政治”的衍变过程。

张耀灿先生曾指出：“原始社会尚未出现阶级，没有政治教育，但有朴素的思想道德教育……进入阶级社会后，思想道德教育融入了阶级性、强化了政治主导，成为思想政治教育，而作为优化、提升人的生存发展方式的根源本质、共同本质仍然存在。这也就是为什么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下，思想政治教育都有着可以相互借鉴的原因之一。”^{[10]12}这段话极为深刻地反映了先秦思想教育实践从“宗教”到“政治”的衍变状态。姑且不论思想教育实践活动原始发生于原始社会还是阶级社会，以最保守的立场态度来看也仍旧会发现思想教育发生之时中国社会较为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比较落后的生产水平必然会导致生存问题的凸显。

正如恩格斯所言：“劳动越不发展……社会制度就越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11]16}，而血族关系支配下的中国社会，原始的自然环境显然会对包括思想精神在内的人们的实践活动产生更为直接的影响，因之在生存或更加完好的生存这一主题之下，宗教性的社会活动就兴起了。直到在阶级社会渐次成形、生产剩余持续增加、阶级分化与对立日趋显著的历史背景下，政治的主题才愈发突出。同时原始的宗教礼仪渐渐褪去宗教的色彩，并进一步转型发展为社会阶级统治和政治国家治理下的礼仪文化，正如李泽厚在评论《周礼》时所言：它“是原始巫术礼仪基础上的晚期氏族统治体系的规范化和系统化……殷周体制……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直接从原始文化延续而来。”^{[12]2}

第三，具体研究先秦思想教育实践的衍变过程，必须解决历史分期这一前提性问题。

基于历史唯物主义价值观与方法论的立场，对先秦思想教育实践衍变过程的论述不得不涉及思想教育实践原始发生的历史时间以及当时的经济水

平、社会属性、政治制度和文化体系等客观历史事实，而这又进一步牵扯出对中国历史加以分期的问题。具体而言就是对“夏朝”这一问题的阐释，即“夏朝”是否存在，若存在究竟是以原始社会晚期氏族部落的形式还是作为早期国家文明的形态而存在，对“夏朝”的历史定位将直接对中国思想教育实践的具体发生时间及其衍变过程的阐述产生影响。近代古史学者如顾颉刚、童书业等皆疑“夏朝”及其历史之存在，而杨宽基于“神话分化说”的立场也认为夏代传说乃周人根据神话演述而成，殷商卜辞中未见夏之踪迹。^①翦伯赞立足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则进一步指出中国所谓之“夏代”实际为生产水平和社会组织处于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的“夏部族”，^②伴随着商对夏的种族征服，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一种代表文明社会、服务于部族统治与剥削的种族国家（政治国家）即“商朝”至此才建立起来。^③

但另一方面钱穆却基于《史记》、《大戴礼记》及《国语》等史料对夏代世系的记载，提出较可靠的古史可从虞、夏算起，且夏代俨然已具国家之规模。^④基于本文主题我们对此暂不做进一步深究，仍以最保守的立场来看待思想教育实践发生的具体历史时间，即将商代作为中国政治国家和阶级社会的起始，同时不否认阶级社会的思想教育实践同商代以前（原始社会）的实践活动存在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因此也必须指出西方学界不论是斯塔夫里阿诺斯，还是基辛格、汤因比等学者，以及颇具代表性的《剑桥中国上古史》等，^⑤仅因文字缺乏而对“夏朝”问题的研究十分贫乏和漠视，直接将商朝和孔学作为中国文明社会与思想文明史的起点，而忽略商之前早期中国社会与中国阶级社会的文化渊源，以及上古社会至商周时期的思想文明与孔学（儒学）之间的深刻联结，这对于先秦时期中国思想教育实践活动科学内涵的探索而言是不科学的。

总而言之，唯有立足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专业的视角，对包括先秦思想教育实践在内的教育实践历史开展研究，方可有效还原思想教育实践发展衍变的历史原貌，最终为积极汲取和有效借鉴中国优秀的传统教育思想奠定基础。

注释：

① 参见张新吾 黄瑞雄：《思想政治教育元问题研究——基于人的自我超越视阈》，《理论导刊》，2017年第2期，第93-96, 101页。

② 参见黄菊 蓝江：《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思想政治教育——一个思想政治教育元问题研究》，《武汉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第91-95页。

- ③ 参见周虎军 何祥林:《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原始发生问题的思考》,《思想政治教育》,2014年第1期,第6-10页。
- ④ 参见王升臻 李俊奎:《思想政治教育原始发生问题再探——兼与周军虎、何祥林同志再商榷》,《湖北社会科学》2015年第10期,第179-184页。
- ⑤ 参见(美)亨利·基辛格著,胡利平 林华 杨韵琴 朱敬文译:《论中国》,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1-26页。
- ⑥ 参见(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 梁赤民 董书慧 王昶译,吴象婴审校:《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第7版修订版)(上、下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55-159,265,359-361页。
- ⑦ 参见(英)阿诺德·汤因比(日)池田大作著,荀春生 朱继征 陈国樑译:《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第223,287-289,294-295页。
- ⑧ 参见(德)马克斯·韦伯著,康乐 简惠美译:《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 ⑨ 参见(美)弗雷德里克·沃特金斯著,李丰斌译:《西方政治传统:近代自由主义之发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41-243页。
- ⑩ 参见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87-189页。
- ⑪ 翦伯赞先生在前期曾认为“夏代”只是中国原始社会晚期的氏族社会组织,但随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发掘,其观点开始发生变化,倾向于将“夏”作为中国阶级社会的起始。(参见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增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 ⑫ 参见翦伯赞:《中国史纲 第一卷 史前史 殷周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00-107,151-156页。
- ⑬ 参见钱穆:《国史大纲 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1-14页。

- ⑭ 参见 Michael Loewe, Edward L. Shaughnessy: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221 B.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参考文献:

- [1] 李翰文主编, (西汉)司马迁撰. 史记 第一册[M].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6.
- [2] 黄寿祺 张善文撰. 十三经译注 礼记译注(下)[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 [3] 李民 王健撰. 十三经译注 尚书译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 [4] 吕思勉. 中国大历史(上册)(全新修订版)[M]. 北京: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5.
- [5] 陈登原. 中国文化史(上册)[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
- [6] 吕思勉. 中国通史[M]. 吉林: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3.
- [7] 李俊奎 王升臻.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原始发生问题的再思考——兼与华中师范大学何祥林教授商榷[J]. 思想教育研究, 2014(6).
- [8]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著, 林华译. 断裂的年代——20世纪的文化与社会[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4.
- [9] (美)弗雷德里克·沃特金斯著, 李丰斌译. 西方政治传统: 近代自由主义之发展[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 [10] 张耀灿. 对“思想政治教育原理”的重新审视[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11(10).
- [11]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2] 李泽厚.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

[责任编辑 王云江]

Evolution of Chinese ideological education practice in pre-Qin period

—A comparative analysis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academic circles

CHAI Peng, DING San-qing

(School of Marxism, China University Mining and Technology, Xuzhou 221116, China)

Abstract: The Chinese academic circles have traced and summarized the evolution of pre-Qin ideological education practice, and constructed a modern disciplinary research system based on the standpoint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philosophy. The way of thinking based on positivism philosophy in the western academic circles directs the research on the practice of Chinese ideological education in the pre-Qin period to the pragmatic position of secular politics, which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scientific presentation of the historical appearance of the practice of Chinese ideological education in the pre-Qin period. The practice of pre-Qin ideological education experienced a process of evolution from survival to humanism, from religious activities to political activities. In the new era, only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view of Marxism, and in the contex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an we continue to expand and deepen the research on the practice of Chinese ideological education, so as to fully explore and develop China's excellent traditional educational thought.

Key Words: the Pre-Qin period; ideological education practice; evolution; comparative study; historical materialism